

書評

《文化研究》第三十七期（2023年秋季）：256-263

重憶埋沒於建成環境的戰爭地景：評介潘律博士著作
《形象、想像與奇想：重映大中華的二戰紀念碑》Rememorizing War-scape Buried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Commentary on Dr. Pan Lu's *Image, Imagination, and
Imaginarium: Remapping World War II Monuments in
Greater China**

藍逸之**

Cassidy I-Chih LAN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
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
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靜
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
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
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穆旦

民國34年9月

民國大陸時期出生，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時期的詩人穆旦，青年時曾因對日抗戰加入中國遠征軍，目睹中華民國軍隊死難慘狀，及滇緬叢林的惡劣環境。以上詩句，便是摘自他致意滇緬戰場陣亡同袍的祭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最後一段。

歷史已往、逝者已矣。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歷史的記憶，為何會無人

投稿日期：2022年3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6月9日。

* 銘謝潘律博士於出版後之贈書，筆者拜讀獲益良多。作者亦感謝本刊二位匿名審查人及助理編輯之熱心建議與協助，特此致謝。

** 藍逸之，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知曉？戰爭的死難與殘酷，為何會被人遺忘？那麼，什麼事情才會被記憶，傳頌古今？潘律（Lu Pan）博士的著作《形象、想像與奇想：重映大中華的二戰紀念碑》（*Image, Imagination, and Imaginarium: Remapping World War II Monuments in Greater China*），選擇大中華區域——中、港、臺三地——的五處二戰紀念碑作為主體，探討其所承載的記憶與歷史，如何被「國家」標定為值得紀念的歷史？如何在建築外觀上賦予特定的政經及文化意義？再者，朝代興衰乃係歷史常態，一旦政權更迭，致使社會-政治局勢動盪，「前朝」遺留的紀念物——不論是碑文、建物、裝飾符號、園區、墳墓或整體景觀，是否還能保存既有的場所記憶？同樣的事件，「新朝」如何重新詮釋，抑或逕自將其掩蓋、遺忘？

針對這些疑問，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不論何種國家或政權，為賦予其統治正當性，都會透過所謂的「紀念」，強化該治理主體應當被「記憶」的部分；從多面向、同步發生的事件中，抽取「值得紀念」之處，具象為可識見（visible）的紀念物，藉以塑造群眾的集體認同，深植有利治理的國族敘事。基於這個觀點，本書以紀念碑，及相關的園區與建築物為研究主軸，認為這些建成環境中的人造物，以「紀念」為名，乃係承載特定記憶的場所，並在空間中，成為對大眾展示形象的具體物件。

相較傳統封建社會中僅供特定階級、身分人士使用的儀式空間（如皇室宗廟、皇家陵園），現代都市社會中，針對大眾塑造集體記憶的案例不勝枚舉。本書提出的五個案例雖各有特點，但作者從視覺出發，從美學、造型到景觀詳加考究，發現這些紀念物除了表現設計者的風格外，也彰顯了治理實體如何在視覺上呈現想讓社會大眾「看見」的歷史。並且，作者在書中也將案例置於其都市計畫與市政建設背景，顯示這些都市景觀中的「看得見」與「看不見」，都源於操作細緻的空間治理術（spatial governmentality），是有意圖的形象篩選，決定了記憶如何被製造、附加或刪除，成為大眾的記憶。

本書依據兩岸三地五處案例，廣納當下政治與社會背景極為不同、卻又有密切歷史承襲與地緣關係的幾個華人社會。其中，不論是民國大陸和臺灣時期的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政府、香港重光後的港英政府及主權移交後的

香港特區政府，還是二戰期間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在這些案例中，都彰顯出類似的操作手法。隨著戰爭勝負分曉、治權更迭，作為見證烽火、銘刻死難、書寫創傷的紀念物，會因主導者不同、意識形態之爭、史觀差異、社經變遷，在話語及視覺上呈現不同的空間詮釋。

本書第一個案例，是見證中華民國軍隊1937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孤軍作戰的四行倉庫。抗戰史上，四行倉庫在華人界的知名度很高；從二戰期間至今，兩岸三地都曾以「八百壯士」為主題拍攝電影。戰時，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而言，四行倉庫代表堅持對日抗戰、激勵全國士氣的象徵。文宣上的照片，除了以遠方景觀突顯四行倉庫在廢墟中佇立，甚至刻意放大屋頂懸掛的國旗。相對地，日本軍方新聞則是強調佔領與勝利，將焦點放在進逼倉庫內部的日軍巡弋，以及倉庫外牆被砲火摧毀的破洞。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基於對臺統戰工作及中華民族復興論述的政治需要，保存四行倉庫並將之活化為淞滬戰役紀念館；另一方面，基於與國民黨的敵對立場，與正當化「新中國」的正統地位，在敘事上則片面移植、穿插與場所記憶無關的紅色文物與政宣，淡化國民政府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與貢獻。

第二個案例是港英政府在香港中環皇后像廣場設置的和平紀念碑，呈現截然不同背景的紀念空間。香港和平紀念碑，仿建自英國倫敦白廳的戰爭紀念碑（Whitehall Cenotaph）。20世紀初，包括香港在內的眾多英國海外殖民地，都有相同款式的戰爭紀念碑；立碑的原始目的，是紀念大不列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犧牲將士，及樹立大英帝國的統治正當性。二戰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原先場所設置的許多英國皇室象徵的雕像，陸續為日方拆除送至日本本土展示，甚至熔為武器原料。戰後，重返香港的港英政府為了整頓香港淪陷的記憶，重新爭取港人認同，除了制定香港重光紀念日，更以此地作為紀念儀式的地點，藉由皇后像廣場的空間改造，使之成為體現都市現代化的公共空間，擴大港人的參與。當然，這些措施，讓和平紀念碑及周圍空間原有的意義逐漸邊緣化。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原有殖民時代的記憶，隨著紀念儀式地點的改變，和平紀念碑更加被遺忘在都市空間中。

同樣地，第三個案例將視野側重於今日臺灣臺北市的圓山一帶。此處在

日治時代原為臺灣神社所在地，除了祭拜1895年征臺行動的日方死難高層，之後亦作為「帝國南進」的勝利象徵，於媒體大力放送。二戰期間，日本殖民政府加強實施「皇民化」政策，神社作為帝國表忠教育的象徵被強化，經改建並擴大為臺灣神宮，周邊則增設了臺灣護國神社及國民精神研修所等建築。戰後，國民政府接收，為了廢除日本殖民象徵，選擇在戰時毀於墜機火災的臺灣神宮遺址設立圓山大飯店，並將原護國神社改造為國民革命忠烈祠。重點是，這些建築都採取中國北方宮殿造型，與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在「國都」南京流行的公共建築樣式如出一轍。弔詭的是，國民政府已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喪失中國大陸的統治權。為了延續中國正統地位，臺灣時期的國府企圖重製國都意象，銘刻在二戰記憶與之截然不同的島嶼社會。原本圓山當地，建造神社的背景，及日本國民精神營造的歷史，隨著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的場所詮釋，成為「光復」敘事下亟欲消除的殖民歷史，掩蓋於「前國都」中式建築的「鄉愁」景觀之下。近年，臺灣社會本土意識的崛起，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動，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記憶，才不再作為民族精神受到社會重視，並招致許多倡議在地歷史保護者的批評。

在廣州與重慶，則有一對更特殊、但設計脈絡彼此相關之案例。相較臺北圓山忠烈祠的抗戰記憶，廣州的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及重慶的抗戰勝利紀功碑，皆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國府興建的抗戰紀念物。有趣的是，由於設計者都是出自廣州襄勤大學建築工程系的同批專家，兩處案例皆有嶺南早期現代主義的影響。有別於當時國府倡導、融合中國傳統宮殿裝飾的中國新古典主義，兩個案例都是造形精簡、摒除華麗裝飾、注重實用功能的「新建築」。唯在意識形態上巧妙銜接當時蔣介石主張的「新生活運動」之基本精神——「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抗戰期間中國社會重要的國民精神原則，兩者都成為嶺南現代主義風格少數遺存的文物。

然而，1949年廣州、重慶陸續為中共「解放」，淪為前朝反動派的國族敘事空間，兩者的場所意義與樣式，都遭受新政權相當程度的破壞或挪用。例如，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的選址，係由指揮官孫立人將軍精心策畫，並與廣州既有的國府紀念空間（中山紀念堂、中山紀念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墓、十九路軍抗日陣亡將士墓園等）形成共同軸帶。1949年後，新一軍紀念塔被軍事管制區覆蓋，進而被當作新建公寓式酒店廁所的現成建材；墓區遭新關馬路切割不再完整；原先設計的紀功亭，則為濕貨市場覆蓋。原本民國時期廣州都市景觀中可見的重要地標，便從此不再識見。

重慶的抗戰勝利紀功碑雖然依舊可視，意義上卻轉化為慶祝「重慶解放」的共和國建國史話。在中蘇友好的蜜月期，紀念碑曾加設蘇聯風格裝飾，迎接蘇聯代表參訪；改革開放政策啟動後，則被市府權充商業廣告展板。隨著近年重慶都市化速度加快，當地作為都市再生計畫的重點地段，如今已被新式商業大樓包圍。然而，兩岸交流增加後，臺灣遊客則促成更為奇幻的場景——為了滿足追尋國府抗戰記憶的臺灣遊客，如今重慶「解放碑」文物解說牌字樣旁，附註抗戰勝利紀功碑字樣，形成兩種史觀、記憶、論述並陳的奇景。換言之，廣州與重慶案例，兩者命運各有不同，但原有場所意義不再被記憶，與新生活運動相依的嶺南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也逐漸被遺忘。

我認為，這本著作，對都市研究、建築史、文化研究或遺產研究，具下列重要價值：第一，近年我們探討遺產保存或是文化旅遊的矛盾，「原真性」（authenticity）是一個重要思路。然而，本書提醒我們，所謂的地方原真性，往往伴隨著當時的國家敘事、施政走向、社會情勢，而有不同詮釋。透過紀念碑作為空間載體，其視覺的表現，便決定/否決了歷史、記憶與事件為何。新的紀念空間，如臺北圓山忠烈祠，也往往透過摧毀原有場所而興建。這些舉措，都不斷覆寫都市景觀、大眾視覺及公共記憶。除非對於原真的歷史有深刻了解的人，在這些原真的建成環境下，無法發掘「所見」物件的「真實」過往。那麼，如果我們無法識見「真實」的歷史，我們還有辦法想像「真正」的地方嗎？

第二，本書選題有很大的企圖心，勾勒宏觀的時空尺度——從戰前、戰時到戰後，涵蓋中、港、臺三地。這個寫作方式的特點是，作者並不以中國近代史固有的「對日抗戰」觀點作為上述案例研究的歷史認識框架，而是將之拓展為「二次大戰」。這個取徑蘊含的廣闊視野，使得我們對日本軍

事擴張的認識，不再局限於中國大陸。若是回溯當時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看到，改以二次大戰作為歷史座標，便可將中國大陸疆界以外、以華人為主體的重要事件及場域納入研究分析。例如，在印緬戰場的中國遠征軍、日治時期的臺灣、英屬時期及主權移交後之香港、中華民國－美國－英國在東南亞的盟軍行動等。同時，這些案例研究不只關心二次大戰期間的紀念物，而是延伸到戰後發展，甚至今日的保存現況。此一取徑幫助我們理解並比較，當代中、港、臺華人社會與都市空間變遷下，這些場所的意義持續演變，以及帶動這些戰後演變的主要驅力或機制。透過這些比較，我們也可以更清楚看到，這些案例巧妙連結到冷戰對立；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蔣介石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兩岸關係的緊繃與和緩；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臺灣的政治解嚴、本土化運動及近年倡導的轉型正義；甚至包含中國近年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帶動的紅色愛國主義教育工程。透過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社會脈動，都對這些紀念空間的記憶如何被「識見」，有了新的空間實踐、歷史詮釋與形象再造。

第三，本書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們，這些紀念物表現的形象與美學，不只是都市規劃師或建築師的個人偏好與風格展現，也與執政者欲鞏固的國家敘事有關。治理威權的正當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政權或威權的轉型，也左右了形制的改造及紀念物的意義。如此，得以解釋，書中幾個案例的意義塑造或轉化。例如，重慶的紀念碑之所以能採用相對冷門的現代主義風格，設計者需要精心加強該風格與新生活運動論述的接軌。戰後香港和平紀念碑所在廣場的改造與公共化，並不能說是解殖的開端，而是港英政府爭取民心、穩定統治的一種都市現代化戰略。作為國府領導抗戰的史蹟，四行倉庫為了爭取臺灣遊客的祖國認同，除了重新包裝與承認這段歷史，甚至「仿真」出當時被砲火摧毀的倉庫牆面。同時，為了鞏固中共的黨國體系教育，四行倉庫也強加中共的統戰論述於其中，植入紅色愛國教育敘事。戰後臺灣，蔣介石堅持興建中華復興風格（華北宮殿風格）公共建築，帶有宣示中國正統地位、對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意識之爭。廣州案例則是最為悲劇的歷史遺產，除了墓園被零碎切割、掩蓋，由於孫立人將軍在戒嚴時期的臺灣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構陷，他與新一軍的歷史被國府刻意避諱，新一軍墓園淪為

國共雙方共同「埋葬」的「不可見場景」。

潘博士的著作，讓我聯想到《遺產利用》（*Uses of Heritage*）作者史密斯（Laura Jane Smith 2006）之論點：遺產的再利用，往往是多方價值的折衷與協商，是一種妥協空間的再現、與史實相距甚遠。筆者認為，透過這些華人社會中的二戰紀念碑做為案例，提供我們更明確、具體的空間參照。這些紀念碑的前世今生，就如本書最後提到的觀看權（the right to look）及反識見（counter-visibility）等論點，讓我們得以反思，如何突破「識見」表象下的威權性，讓真正的公共史得以重現，是我們討論這些都市遺產保存/活化的爭論中，另一個值得探索的重要課題。

最後，筆者基於過去旅居中國之經驗，也有幾點欲與本書對話的想法：其一，作者在全書一開始便提及，她近年極有興趣展開對中、港、臺三地二戰紀念碑的研究；其在書名與第一章內，便大量運用「大中華」一詞來指涉本書涵蓋兩岸三地的五個案例。然而，誠如哈定（Harry Harding 1993）之看法，「大中華」乃係高度爭議與多變的概念，可狹隘指涉兩岸四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亦可拓展至南洋如星馬等華人眾多的國家，甚至泛指歐美及其他國家的國際華人社群；意義上，也可包含經濟統合、文化交流與政治統一等概念。唯因研究者需要有別，多彈性抽用箇中面向，因而呈現高度疑問。綜觀全書，作者對於為何運用「二次世界大戰」取代「對日抗戰／八年抗戰」，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解釋，唯「大中華」一詞在書中的意涵及地理範圍，則相對欠缺清楚的界定。若有機會於再版中釐清，或許可對照其書中的討論主軸，「重現『華人性』（Chineseness）（及其否定）的失語政治、西方／日本殖民遺緒，及這些因素對該區域二戰記憶敘事之影響」（Pan 2020: 17-18）。

其二，順應大中華的概念，個人認為，案例應可拓展至二戰時期同屬英國殖民地、華人為主的星馬社會。同樣地，順著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足跡，中國遠征軍在印緬戰場上也遺留許多至今遺存的公墓或紀念碑，前幾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曾至這些地區移靈、並奉安於臺北圓山忠烈祠。如今位於印緬的國軍遺址狀況如何，可能也是值得深究的案例。

其三，呼應作者所言，採取二次大戰作為申論的時空座標，有益於綜觀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同盟國陣營的合作軌跡。若是如此，根據個人經驗，雲南省會昆明市內，至今仍遺留大量飛虎隊及中美混合聯隊的遺址與紀念物；至於雲南省騰衝市區，亦留存國府興建的「國殤墓園」——用來紀念騰衝戰役陣亡的中國遠征軍及部分美軍將士——在文革期間亦遭受破壞，1990年代後才逐漸恢復，並新設中國遠征軍名錄牆、擴充盟軍死難人員碑址、設立滇西抗戰博物館、賦予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定位。對照其他五個案例，這些場址尚有英、美方死難軍人的葬墓群及紀念碑乃是更有力的同盟國象徵。

當然，以上見解僅為個人發想，無損本文對於本書之創見價值、作者投入能量與考據周延之肯定。他日若本書再版增訂，冀希上述幾點淺見，作者能多加考慮。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穆旦 (Mu, Dan)。1945。〈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Senlin zhi mei—ji hukang heshang de baigu” [The Spirit of Forest: Sacrifice to the Bones of the Dead in the Hukawg Valley]。《圖翁現代詩歌》*Tuweng Xiandai Shige* [Tuweng Modern Poetry]。Retrieved from: <http://poem.tuweng.com/1940/mudan/1445.html> on Aug 30, 2023.

二、英文書目

Harding, Harry. 1993.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660-686.

Lu, Pan. 2020. *Image, Imagination, and Imaginarium: Remapping World War II Monuments in Greater China*.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Smith, Laurajane.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